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的话语流变

杨晶◎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历史与现场丛书

孟繁华 贺绍俊 主编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的话语流变

杨 晶◎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革命女性到女性革命：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的话语流变/杨晶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8

(历史与现场丛书)

ISBN 978 - 7 - 5203 - 0078 - 0

I. ①从… II. ①杨… III. ①妇女文学—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064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席建海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7.5

插 页 2

字 数 216 千字

定 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契机与宿命：民族国家建构与发现妇女	1
第二节 告别闺阁：秋瑾的革命与写作	8
第一章 现代女性革命小说的多重话语	19
第一节 女性的角色	19
第二节 爱情与革命	22
第三节 革命中的身体	25
第四节 革命的沉重	30
第五节 探索男性世界	33
第二章 大革命时期：在转变和激情中走出自我	37
第一节 北方都市：娜拉的苦闷与出走	41
第二节 爱情与革命的交融	55
第三节 同盟幻灭与男性的销蚀	76



第四节	南方战场：换装与越位的“女兵”	84
第五节	“忘记自己是女性”	95
第三章	左联时期：在革命磨砺中面向社会	105
第一节	“要革命还是做母亲”	106
第二节	爱情与革命的艰难抉择	120
第三节	双重压迫中的受辱与反抗	131
第四节	“拯救”者男性的降生	139
第四章	战争时期：革命政治中的反思与沉寂	156
第一节	革命中的“疯女人”	158
第二节	革命家庭中的爱情	166
第三节	革命与贞节的悖论	190
第四节	延安：理想与现实之间	207
第五节	“复原”的男性	222
结语		245
附录	写在后面的话	256
参考文献		268

绪 论

第一节 契机与宿命：民族国家 建构与发现妇女

中国的 20 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风雨飘摇的晚清帝国危亡时刻的到来，“革命”作为拯救的唯一道路逐渐被社会所认识和呼唤。应该说，历史上的中国从来未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是“天下”，其他地方都是围绕中国的化外“狄夷”。资本主义带给西方的不仅是社会的巨大飞跃，最为重要的是创造了一种空前强大的文明，新的格局在世界形成，整个世界的秩序被动摇。中国几千年来的“天下”观念从鸦片战争开始遭到瓦解，从晚清开始被迫进入充满竞争和压力的世界新格局。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仅 1895 年至 1911 年期间，中国政府承担的赔款和因战争带来的军事借款就高达 476982000 两，这相当于 1895 年至 1913 年期间在中国的所有企业全



部创办资本的两倍以上，意味着中国的可用资源大量枯竭。^① 经过1897年到1898年的割地狂潮和门户开放政策后，到了1900年，西方列强在中国十八个行省中的十六个已经建立了势力范围。这些事实触目惊心，康有为为此发出警告，认为中国有成为第二个缅甸或印度的危险。^② 在世界舞台上创伤深重的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格局中，民族共同体的生存诉求成为步入现代社会的最根本动力。“国家而非种族成为真正的主体和现代认同的根源，并重构了中国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想象结构。”^③ 在中国现代性进程中，民族国家自此成为最重要的内容。

甲午海战之后，特别是戊戌变法之后，随着最后一次社会变革的失败，中国对西方的“民族国家”思想开始有了真正的认识。在“民族国家”意识的自觉下，民族主义开始成为具有统一意识形态的政治运动，并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方式，这意味着民族主义在今后的历史时期开始作为新的历史力量崛起。1911年辛亥革命的失败意味着真正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案并没有找到，以“革命”的道路来拯救危机中的民族国家，挑战的难度是巨大的。危亡时局中中国道路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巨大呼唤。

在民族国家利益最为重要的时刻，在沉重的伤痛与屈辱逼迫下中国知识分子为政治实践寻求新的解决方案时，“女人”的价值重新被重视。妇女问题正是作为民族存亡、强国保种的意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讨论的。维新知识分子普遍认为体弱无知的妇女是国家富强的重大障碍。这种障碍首先是“不生利”说。这种对妇女身体的认识梁启超早在1890年的《变法通义·论女学》中就被反复阐说：“凡一国之

① 参见[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② 同上书，第116页。

③ 汪晖：《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2页。



人，必当使之人人各有职业，各能所养，则国大治。其不能如是者，则以无业之民之多寡为强弱之比例。”^① 生利之人多，分利之人少，国家即强；反之则弱。梁启超认为：“中国即以男子而论，分利之人，将及生利之半，自公理家视之，已不可为国矣。况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原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② 这种认识也出现在晚清大臣张之洞的感叹中，在他看来中华两万万妇女因为缠足“或坐而衣食，或为刺绣玩好无益之事……不能直立，不任负戴，不利走趋，所作之工，五不当一，是此四万万人者，已二分去一，令为二万万人”^③。这里是从妇女的劳动能力来审视其身体价值的，根本出发点是对国家的维护。

中国妇女的缠足被认为是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经成为一件最具中国“现代性”特色的文化事件。古代缠足的起兴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三寸金莲”是性别审美的标记，对于女性意在强化性征。但到了晚清，小脚已成为祸国殃民的象征，成为代表落后、愚昧、压迫、耻辱等的不祥之物。1898年康有为给光绪帝的《请禁妇女裹足折》中表述了这种遭异族耻笑的民族屈辱感：“最骇笑取辱者，莫如妇女裹足一事，臣窃深耻之。”最后康有为将它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来认识：“试观欧美之人，体直气壮，为其母不裹足，传种易强也。回观吾国之民，尪弱纤傴，为其母裹足，故传种易弱也。今当举国征兵之世，与万国竞，而留此弱种，尤可忧危矣！”^④ 曾继辉也在《不缠足会驳议》一文中公开疾呼：“今者

① 《时务报》第23册，1897年4月12日。

② 同上。

③ 张之洞：《南皮张尚书戒缠足会章程叙》，《时务报》第38册，1897年8月11日，第2624页。

④ 康有为：《请禁妇女裹足折》，李义宁、张玉法主编《近代中国女权运动史料1842—1911》（上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509页。



欲救国，先救种，欲救种，先去其害种者而已。夫害种之事，孰有如缠足乎！”^① 这里对女性身体的强调被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上，显然最终是为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看似激进的批判本质上依然是被传统的思维所支配。在他们看来，女性体弱无学识，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质量。实际上再生产能力一直被看成是女性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最重要价值，从这个层面来认识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是世界许多国家的共识。“在多数现代民族国家中，家庭被奉为民族道德的载体。国家之所以有责任教育和‘解放’妇女是因为有必要塑造出能够在生物学和文化意义上生育‘优质’公民的高效母亲。”^② 维新知识分子对于女性的缠足问题，最终依靠民族主义的叙述策略才得以取得成效，光绪帝和慈禧接受了禁裹足的请求，不缠足运动在全国推行。

对于女学的强调，出于同样的逻辑。可以说，倡导女学对于晚清时期的中国而言，确实是一次极大的挑战。从 1844 年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第一所女子学校起，到 19 世纪 80 年代，中国境内几乎所有的女子学校都是由传教士建立的。虽然传教士建立的女子学校为中国的女学带来了新的元素，但是始终没能成为中国本土女性教育的主流。直到 1898 年在上海才由中国人自己创办了第一所女校——经正女学。期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不能不说是漫长的历程，它说明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根深蒂固和女子教育的步履维艰。虽然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仅存在了两年，但是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却极为重要，它为打破传统旧规提供了改变观念的社会氛围。

最终打破这种困境的仍是以梁启超等为首的维新知识分子。1896

① 曾继辉：《不缠足会驳议》，《湘报》1898 年 9 月 10 日。

② 转引自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导论》，王宪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0 页。



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变法通议》，对女学的转变有重大影响。在其《论女学》一篇中，他将女子教育问题与民族存亡联系起来。他指出：“吾推及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在他看来，让女性接受教育是中国摆脱落后、家庭摆脱贫穷的重要途径。梁启超强调了维持社会稳定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正人心、广人才”。“而二者之本，必自蒙养始，蒙养之本，必自母教始，母教之本，必自妇学始。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1897年，经正女学筹备期间时，梁启超为其撰写了启事《倡设女学堂启》，进一步阐发自己的女学观。他把女子教育的目的归纳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之后，梁启超进一步借助了民族国家这一策略：“夫男女平权，美国斯甚。女学布灌，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三代女学之盛，宁必逊于美日哉？遗制绵绵，流风未沫，复前代之遗规，采泰西之美制，仪先圣之明训，急保种之远谋。”在与民族国家的再次联结中，女性教育终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赢得了自身的合法性。在启事发表的第二年，经正女学正式成立，学堂招收8至15岁，有基本读写能力的年轻女性。在民间呼声日渐强烈的情况下，清政府在1907年颁布了中国第一个女学堂章程——《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虽然仍把三从四德等传统女德教育规定为女性基本教育，以贤妻良母为培养目标，但它正式承认了女性教育的合法性，并奠定了官办女学堂的法律基础。

章程颁布后，中国的女性教育很快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至1909年，“全国已成立女子小学堂308所，占小学堂总数的0.6%，共有女学生14054人，占小学生总数的0.9%”^①。

无论如何，女儿们最终走出了家庭。女性教育能够最终得到存在

^① 程璜凡：《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79页。



的合法性，最根本的原因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女学“是一个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它不单十足反映国际竞争情势在当时对中国所造成的绝对压力，它同时也揭示一个父权对国权低头过程”^①。“这种将国家命运关联于妇女智识……相对使妇女身体的存在价值工具化，是试图将两万万妇女的劳动生产力和智识化为一股国力的基础的努力。”^②但这种功利化的目的不能不说带来了女性的解放。从动机而言，女学堂的建立只是为了强国保种，但另一方面，女学堂的建立作为“近代民族国家想象过程的重要一步”^③，最重要的在于这种制度的合法化，从客观上为改变女性几千年来的“身份”提供了最根本的保障。没有女性教育社会机制的改变，对于女性来说，改变几千年来的社会地位、角色是根本不可能和无法想象的。因此，在民族国家的诉求下，女学得以一步步壮大，中国女性的命运以此为标志开始具有了现代性的可能。

民国初期，教育部颁布了《壬子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还将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和高等师范纳入学制中。至此，女子教育以完整的体系完成转型，延续了19世纪晚期清政府未能完成的任务，女性教育转变成国家为达到民族强盛的重大战略，女性的社会角色遂合法化。

中国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女作家陈衡哲、袁昌英、谢冰心、黄庐隐、石评梅、陆晶清、苏雪林、冯沅君、凌叔华、陈学昭、白薇等人，都受惠于民国初年颁布的《壬子学制》，因为这个章程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女子教育，为女子受教育的权利扫除了制度性的障碍。

①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1895—1937）》，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② 同上。

③ 乔以钢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与性别》，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



1911年清政府制定了《编订女生留学酌补官费办法》，女学生留学海外获得了与男性同样的官费补助权。中国早期出国留学的女性是从传教士资助携往开始的，但人数寥寥无几。后来大多是以陪读的身份自费走出国门的，其中以留日最多。相对于没有明确学习目的的伴读，奖励留学政策的颁布提高了留学生质量，极大促进了女性留学的发展。据1914年统计，在1300名中国留美学生中有女生94名，1917年增加到200名。^①1925年，留美学生总数为2500人，其中女生占640人，比例高达25.6%，^②这达到了近代中国女性留美的顶峰。自1902年至1953年间，在美国大学注册的中国女子留学生总计达3692人，约占同期中国留学生总数的18%。^③至“五四”时期，日、美、法、德、俄等国都有大量的女留学生。1930年至193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对女性留学作过一次统计，据推测，留日女性总数在6000人以上，留欧女性在2000人以上，总计留日、美、欧女性人数当超过10000人。^④这个数字对于女性教育兴起不久的中国已经是相当庞大了。

特别指出的是，从深闺走向世界，这些与女性相关的一系列教育制度造就了一批妇女人才，回国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现代职业女性，如创办了最早的女子报刊的陈颖芬，中国第一个女医生康爱德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客观上，中国女性参与到全国范围内的社会巨变之中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这种巨变为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有学问而后有知识，有交际而后有社会，有营业而后有生利，

① 参见《留美中国学生会小史》，《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12期。

② 参见汪一驹《中国知识分子与西方》，久大文化公司1978年版，第106页。

③ 参见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611页。

④ 参见王焕琛《留学教育——中国留学生教育史料》，台湾“国立”编译馆1980年版，第2626页。



有出入自由而后去种种之束缚、得种种之运动。”^①至此，晚清知识分子们关于民族国家的设想在从反缠足到兴女学再到现代学校建立的过程中一步步变成现实。

女性试图寻求社会空间时面对的挑战无疑是巨大的。从晚清至民国，实际上，“女学生”身份与传统女性已截然不同，她们不再是家庭中安守闺房的女儿，而是“有学识”的女性，这是进入社会成为自立的“人”的开始。走出闺阁的女性们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具有现代思想的学校成为新型女性成长的理想空间。她们的成就宣告了重新塑造自己的成功，具有了“革命性”的意义。新的身份获得的社会性地位“具有高度的流动性，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它的流动性，使得她们的文化和政治存在超越了绅宦家族的结构，而这种结构正是帝制结构的根本”^②。走出家庭，进入学校，迈进社会，在女性解放道路上，“女学生”身份的获得标志着女性从历史地表浮出并进入历史舞台的开始，中国女性解放的幕布正式拉开。

第二节 告别闺阁：秋瑾的革命与写作

在文学的历程中，秋瑾被视为“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人”^③，“在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蜕变中，秋瑾做出了重要贡献”^④，她的创作成为结束古代闺阁文学，开启现代女性文学的标志。但显然其中最重要的恐怕不在于其艺术形式与语言上的贡献，它们与“新文学尚有

①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说》，《女子世界》1904年第4期。

② 颜海平：《中国现代女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页。

③ 阎纯德：《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④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明显距离”^①，最根本的应在于秋瑾对女性精神品格的重构：在中国现代性的历程上，她以自己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革命”之路，即将女性自我与民族国家的建构真正融为一体的道路，这是一条独特的女性解放之路，对女性建构，她做出了自觉的努力。就此而言，她在20世纪中国女性自我奋斗的道路上，给出了新的视野，秋瑾的精神润泽并引领了追求自由解放的中国女性。

秋瑾的创作是由两个文学世界构成的，她不只具有作为一个革命斗士的叛逆精神，还有女诗人特有的诗情气质。尤其是秋瑾早期的诗词，大都属于闺阁才女的咏怀之作。“多愁善感，抑郁忧伤，是传统妇女文学创作主体最为鲜明的基本性格特征”^②，秋瑾的创作也是多以“闺怨”为主题。与传统脉络相同，这些诗词都是在自我狭隘闭塞的小世界里吟花弄墨、诉说离愁别绪。抒情主体始终是一个易感多愁的女性沉埋于个人情怀入微体验和细腻品尝，伤春悲秋、思亲怀友：

春色依依映碧纱，窗前重发旧时花。

燕儿去后无消息，寂寞常年王谢家。

——《春日偶占》

容易东篱菊绽黄，却教风雨误重阳。

无端身世茫茫感，独上高楼一举觞。

——《重阳志感》

肠断雨声秋，烟波湘水流，闷无言、独上妆楼。忆到今宵人已去，谁伴我？数更筹。寒重冷衾裯，风狂乱幕钩，挑灯重起倚熏篝。窗内漏声窗外雨，频点滴，助人愁。

——《唐多令 秋雨》

① 乔以钢：《中国女性的文学世界》，湖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55页。

② 同上书，第145页。



秋瑾最喜欢以花入诗。在她笔下，各种以“花”为题的诗词多达二十多首，从梅、兰、菊、荷、桃到玫瑰、海棠、杜鹃、芍药、水仙、木兰，几乎花花入诗，其中又以咏梅、咏菊最多：

杜鹃花开杜鹃啼，似血如珠一抹齐。

应是留春留不住，夜深风露也含凄。

——《杜鹃花》

铁骨霜姿有傲衷，不逢彭泽志徒雄。

无桃枉自多含妒，争奈黄花耐晚风。

——《菊》

桃姨杏妹嫁东风，玉砌珠栏晓日笼。

可怜憔悴罗浮客，独立寒霜秋雨中。

——《梅》之二^①

这些作品中，感伤明显居于情绪的主导地位，属于传统的闺阁之作，但在早期的诗词中实际上已经潜隐着与一般闺怨不同的差异。在上述作品中，没有寻常小女儿的娇柔无力、自怜自艾的脂粉气，而是胸襟开阔，清丽高洁，她的诗风正来自于她坦荡、真诚，而又坚强自守的个性，这说明早期的秋瑾就有着鲜明的自我意识。此外，在创作中，书写婚姻的不幸是她最为郁郁难解的伤感部分，在诗中她这样写道：“却怜同调少，感此泪痕多”（《思亲兼见大兄》），“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精卫石》），“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满江红·小住京华》），“对影喃喃，书空咄咄，非关病酒与伤别。愁城一座筑心头，此情没个人堪说”（《踏莎行·陶菽》），“小坐临窗把卷哦，湘帘不卷静垂波。室因地

^① 所列作品均选自《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僻知音少，人到无聊感慨多”（《秋日独坐》），等等。这些感怀之作与传统女子因丈夫或情人伤离伤别的忧愁也有所不同，秋瑾的苦闷抑郁不在于不能朝朝暮暮的相伴，而是难觅知音的精神压抑，这些都体现了秋瑾早已有了比一般女性强烈的主体意识，拥有同时代女性难以具备的精神品格。

自我身份的认同，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文化认同，它与阶级、民族、国家、种族等身份的认同交织在一起。“在相对独立、繁荣和稳定的环境里，通常不会产生文化身份的问题。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既有的方式受到威胁。这种动荡和危机的产生源于其他文化的形成，或与其他文化有关时更加如此。”^① 在社会的深刻危机以及个人生活的压抑痛苦中，秋瑾开始重新认识和建构自我，这导致了她的生活和写作的一系列转变。

甲午海战惨败以来，从戊戌变法的失败，到八国联军的入侵，种种灾难性的打击使晚清政权的政治已陷入瘫痪，一个文明正在濒临前所未有的崩溃。在历史危机时刻，社会的现有准则被纷纷拆解。从戊戌维新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对妇女问题的思考从“强国保种”发展到了对妇女权利的重视。在二十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前夕，“女国民”概念应时而出，它的提出表明了妇女观念的进一步转变。“女国民”的概念，蕴含着女子与男子平权的思想，认为女子与男子一样，都是国民中的一员，它将女子与国民的社会身份联系在一起，号召女性在追求权利的同时自觉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在漫漫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妇女得以第一次突破了家庭等级序列中的身份，它表明，女性不再甘受封建礼教的奴役，开始拥有了自己的社会身份。

^① [英] 乔治·拉伦：《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5 页。



“女国民”标志着“崭新的妇女历史的到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因此，“新的身份”的赋予大大激励了妇女们的热情，它推动了女性独立意识的自觉与增强，“女国民”的社会身份很快就成为时代的崇尚，从此，成为中国的妇女界一个至高至上的目标，这种精神贯穿于辛亥时期的妇女解放思想。

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召唤下，秋瑾自觉成为女国民精神的崇尚者和实践者。秋瑾的革命是从家庭革命开始的。1904年中秋，作为缠足女子的第29个年头，秋瑾给自己放了足，脱下了长裙，穿上了男士西服和长裤。当她在京师妇女座谈会上出现的时候，身着男装的秋瑾引起了不小的惊愕和骚动。秋瑾以对身体的改造宣告了自己革命的开始。在《自题小照·男装》中，秋瑾是这样描述自己换装后的心理感受的：“俨然在望此何人，侠骨前身悔寄身。过世形骸原是幻，未来景界却疑真。相逢恨晚情应集，仰屋嗟时气益振。他日见余旧时友，为言今已扫浮尘。”^②秋瑾在镜中的“过世”和“未来”两个时间中看到了“旧我”和“新我”两种不同的身份，它以身体为载体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易装标志着秋瑾对“自我”自觉发现的开始，作别闺阁的强烈渴望最终推动着她开始寻求新的人生道路，走上解放的起点。

1904年初夏，秋瑾与一向感情不和的丈夫决裂，与7岁的儿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忍痛作别，变卖首饰做学旅费东渡日本。她去掉了原名“闺瑾”中的“闺”字，也不用意为美玉的字“璇卿”，取了富有时代色彩的“竞雄”为字。在船上，秋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万里乘云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

① 王绯：《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5页。

② 秋瑾：《自题小照·男装》，《秋瑾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